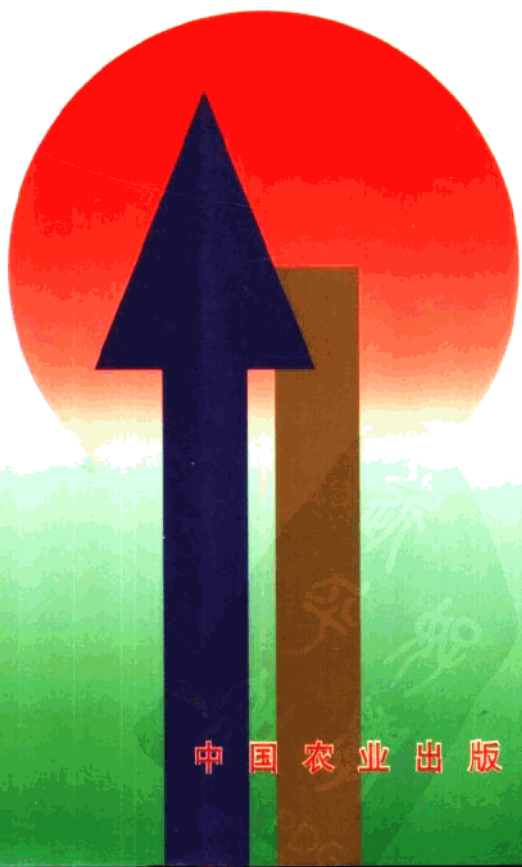


农户经济增长 与发展研究

史清华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STUDY ON HOUSEHOLD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数千年来,农户经济都是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主体,它承担了我国居民的衣食供给,绝大部分税收、兵源和徭役负担。可以说,没有农户经济的贡献,就没有我国的文明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二十多年期间拒绝农户经济,使农民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结果,遭致农产品短缺,城乡居民缺衣少食,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本来充满希望的一个新兴经济落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我们重新重视农户经济的作用,才再度激起农民的生产热情,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实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结束了长期以来农产品短缺的被动局面。同时创造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伟大业绩。对我国这段经济发展的曲折史实,由于涉及的因素很多,自然会产生各种解释和论述,但是农户经济的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现有的农户经济可适应任何经济发展阶段与任何制度变革。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我国目前高自给、低效率、低收入的超小型农户,自身经济增长和发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们市场需求很小,而且最终也会从供给方面阻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仍说我国有九亿农民搞饭吃,可能不准确了,但说靠大多数农户为少数非农户提供食物则仍是事实。且这些农户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食品消费远低于非农户,可以说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矛盾。这个不平衡如果长期存在,国民经济将如跛子长征,拖累不轻!

改革农户经济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不是我国特有的过程和问题。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都积累了不少解决这方

面问题的经验和学说。若归纳一下，这些经验和学说大致有两类：一是通过农业合作改变农户的生产条件和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地位；二是通过转让、租赁农户资产或农户资产入股，把它们纳入大规模企业经营。我国广大农业经济工作者正利用这些经验和学说的积极成果，进行着适应我国农业和农村实际的农户经济发展探索。由史清华同志撰写的这本著作就属于这类探索的一部分。

本书的特点是聚焦于农户这群最基层经济细胞的变化与发展。作者运用大量资料与数据，从量的变化与积累中形成结论和观点。其中许多对我们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与研究是很有启发的。如农户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将成为农户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的重要依托；农户家庭经济资源的非农化利用是农户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农户经济行为也是理性的，其资源配置完全是以资源利用效率为准则；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呈加剧趋势等。

读者会注意到作者所用是一组长时期连续跟踪观察的农户分户资料。时间跨度从1986到1997年。从时序上弥补了截面分析的不足，并将研究定位化。作者广纳不同学派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户综合指数分类，分析方法是先进而缜密的。足见作者为本书付出的艰辛。也不难想到这份成果内含的质量与价值。虽然材料来自中国北方的一个省份，但书中揭示农户经济的基本变化和发展趋向是带规律性的，其中许多结论与观点相信在其他省区也是适用的。而采用的分析方法和形成的理论，也可供在其他地方作类似研究时的参考。

我们希望看到更好的这类成果问世，共同促进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

史清华

1999年3月30日

自序

——我的农家情结

我的农家经济书稿经过多次修改终于脱稿。但当我掩卷思考时，总感到在这部书稿里还缺了点什么，使得书稿显得不够完整与系统。无奈出版社有字数限制，权且将全面系统的农家经济分析想法留到下部书来完成了。由此，我的农家情也就要继续延伸下去了。

我是一个从农家走出，又走回到农家的学子。虽说在形式上我已完成了望子成龙的父母的心愿——“跳农门”，但在行动上，我总也跳不出这个生我养我的农家门槛。事实上，我打心里也从来没有想要跳出这个门槛。因为我的身世已决定了我与农家是不可分割的，虽说那不是我的选择，但却是我应当尊重的现实——我是一个农家之子。我骨子流的是农家的血，言行中印的是农家的痕，我对农家有一种说不出的爱，我打心里喜欢农家。俗语讲的好：“鸦尚有反哺之情，羊尚有跪乳之恩”，何况我们是吃农家奶汁长大的农家之子。回归农家，为农家的兴旺发达，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应当说是我毕身奋斗的目标。

我上大学选择的是与农家有关的农业学校，我上研究生选择的仍然是农业学校。我喜欢农业，更喜欢农家。无论是在看电视，还是在听广播，我选择的也多是些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节目，也许是职业习惯使然，但是我的深深的农家情结却是其中之根本。我看过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也看过苍生先生的《苍生》，从他们的小说使我进一步对农民这普天之下最平凡的苍生，他们为了生活所进行的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所折服。作为一

个从农家走出，又要回归农家的学子，我拿什么作见面礼？所以，只好用这一农家研究作礼物去见农家。

我喜欢农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农家的质朴。我从农家来，深深懂得农家生活的艰辛，但也多次尝到过农家“神”一样的待遇。记得在1990年我到山西一个普通农村进行“三同”生活时，面对农家间的待遇高低差异，几位同行的大学毕业生议论纷纷，都感到有点吃不肖的感觉，但我不同。事实上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明显地，我对农家的境况和农家的质朴理解要较他们高的多。众所周知，农家大多是信佛的，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到庙里去祭“神”，在这一活动中农家所用祭品有好有坏，有用白净的馒头祭神，有用发黄的馒头祭神，但每一农家祭神的心意却是完全一样的，不分黄白的；事实上神也没有因祭品的好坏而对农家差别对待。我常常拿农家的祭祀活动与其待人接物活动进行比较，发现农家在接待类似我们这等“公家人”时各家的用心均同敬“神”，神都对农家能一视同仁，而我们这些从农家走出，又回到农家的学子又有什么资格对农家进行挑剔？难道农家拿出自己十二分的努力接待我们，我们还有资格说长道短吗？从某种角度看，农家的这一质朴应当说是各类家庭所特有的，它恰恰是构成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的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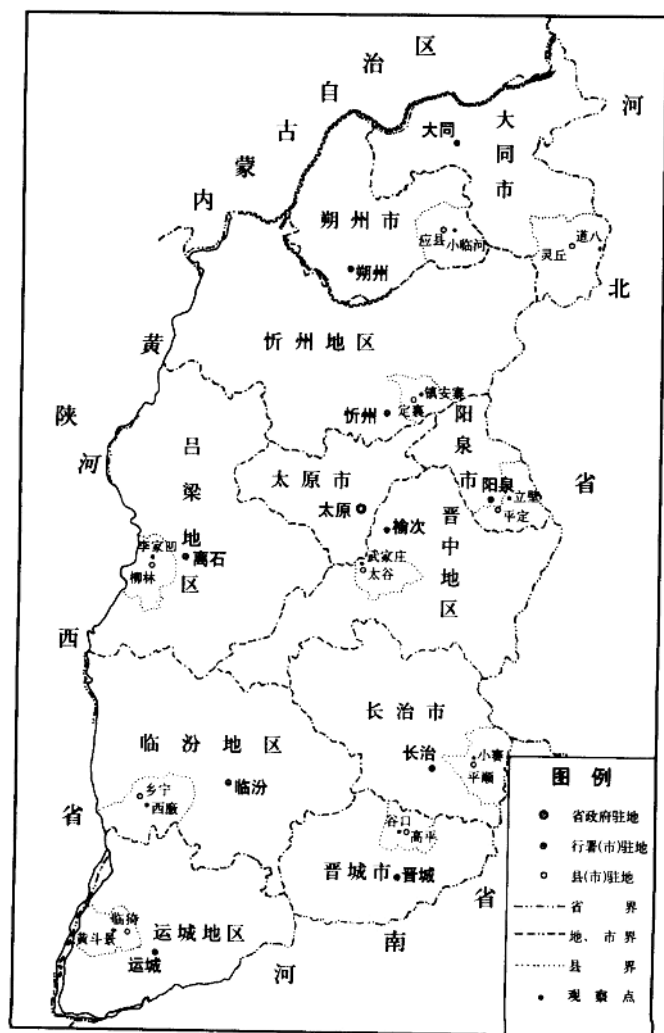
通过几年来的研究，发现：农家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强大的基础，她于国于民所求甚少，而奉献却是最大的。她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缓慢与她的质朴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农家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最大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输送源。与此同时，这种资本的外流也构成了农家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源。就拿农家人力资本建设投资来说，一般地，农家在子女教育上投资很多，但回报却十分有限，为什么十村跟踪观察户的高中水平类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没有同其学历上升而增长，可能与类似我们这些上了大学的子女很多都真的“跳了农门”有关系。说实在的，在农村上了大学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农户经济发展最有潜力的人力资本，但

却远离农家。从国家经济发展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从农家经济发展来看，这能说不是一个悲哀吗？农家投资不仅不能直接为其服务，还在这一经济活动中失去了很大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难道这不是农家的质朴文化的结果？试想除了农家，那一个组织愿意无偿投资于人力资本建设呢？也许这样做对单个农家来说，非借贷性收入在一定时期会有有一定的增长，但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说永远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从这一个角度看，国家向农村进行一定的无偿投资是应该的。在农村进行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农家问题作为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中的核心，应当是受到研究者与决策者十分关心的大问题。但是目前这一关心还多停留在口头上。让我们以实际行动一块为农家以及“三农”经济的振兴服务吧！

作 者

1999年4月



山西省农村调查固定观察点分布图

谨以此书献给

全国 300 多个固定观察村及
2 万多个观察农户



史清华，男，1964年生，山西襄垣人。1989年毕业于宁夏农学院，获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在山西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综合考察研究所从事农经研究工作。1997年晋升为副研究员，同年被山西农业大学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1999年获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研究。参加工作以来，累计参加或主持国家、省、部级研究项目21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12次，其中一等奖2次、二等奖4次、三等奖6次。合作出版著作8部，发表科技论文60余篇。目前主要从事农户经济研究，已发表论文30余篇。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农户家庭组织及其演变	9
第一节 农户家庭组织规模及其发展趋势	10
第二节 家庭类型及其组织结构分析	16
第三节 农户家庭决策权分析	18
第四节 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分析	20
第二章 农户经济增长源泉	29
第一节 农户经济总体运行趋势	29
第二节 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40
第三节 农户经济增长之源泉	51
第三章 农户家庭经营产业分化过程	61
第一节 农户经济序次变动分析	61
第二节 农户产业分化历程分析（一）	70
第三节 农户产业分化历程分析（二）	79
第四节 农户非农分化历程分析（一）	84
第五节 农户非农分化历程分析（二）	94
第四章 农户经济的理性行为	106
第一节 农户理性行为概述	106
第二节 农户家庭资源配置行为及效率	109
第三节 不同经营类型农户家庭资源配置行为 及效率	115
第四节 不同文化类型农户家庭资源配置行为 及效率	120

第五节	农户人力资本建设投资行为及效率	125
第五章	农户粮作经营行为	127
第一节	粮作种植在农户经济中的地位	128
第二节	农户粮作经营的比较效益和机会成本	132
第三节	农户粮作经营的生产函数模型	138
第四节	农户主要粮经作物种植意向与产量期望	146
第五节	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粮食总量平衡及 结构演变	158
第六章	农户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164
第一节	农户收入水平变化及其分层演变趋势	164
第二节	农户收入不平衡性及其演变趋势	168
第三节	衡量农户收入不平衡性的两个重要指标 数值的演变趋势	172
第四节	两极农户特征比较	174
第五节	农户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根源分析	190
第七章	农户经济发展环境	209
第一节	农户经济发展的时代环境	209
第二节	农户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211
第三节	农户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214
第四节	农户经济发展的组织环境	219
附录	十村情况简介	223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42

一、问题的提出

当时间推演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时，在中国农村，农民自发地又一次发起了一场革命性运动。运动从运行了近 20 年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革开始，由于一些地方农村干部素质低下、管理水平极其落后，加上“左”的思想影响，使得农村政策长期与实际情况不符，农民生活到了难以维继的地步。一群贫困到不能维持“生存”的农民，暗地里开始了对当时中央农村政策的“抵制”，私下里与村干部串通，将集体的土地分到户，搞起了“包产到户”。虽说农民的这种行为在新中国建立后已不止一次出现过，但唯有这一次农民的行为最终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并被广泛推广，由此引发了中国农村在本世纪末一场最大的农村经营组织制度变革。这一变革使得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粮食问题和农民的温饱问题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就基本解决。同时也使得农户家庭经营组织功能再一次得到了确立。但是关于农户这一经营组织的争论却并没有到此为止，农户家庭经营在中国一直被当作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看待，因其经营土地规模小，在农业经济辞典里，农户经济又被称为“小农经济”。在家庭联产责任制推行近 20 年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小农经济”运行状态、作用、前景以及今后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一些实证分析。这是我考虑将农户经济作为本书主题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拥有世界农业人口的 1/5 还多。尽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呈急速下降趋势，但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却一直

是相当牢固，其中之原因与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持续高份额不无关系。正如美国已故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所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构成了人口的全部”^①。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40%的农民‘养活’世界仅仅7%的‘非农民’”^②。当然，这些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并不十分准确，作为职业农民（Farmer 或 Cultivator），中国人在其中所占份额可能要小于此数，而作为身份农民（Peasant），中国人所占比重则可能要远高于此数。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农民中一半甚至更多都是炎黄子孙，也许并不夸张。所以，中国的农民研究应该独步全球，以建立中国特色的“农民学”为目标。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农户这一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形式，由于其拥有或承包土地规模较小，所以常常把农户经济称为小农经济。在中国两千年乃至更久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中国的经济一直处在传统农业时代，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如何可以说直接关系到过去历朝历代的兴衰与更替，而在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中，农户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户经济是支撑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组织。即使在今日中国，工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急剧下降，农业这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由此，农户作为这一基础产业的主要承担者，其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就应当得到各方面的保护和支持。但是实际情况如何？从一些研究结果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农户可能得到的保护和支持却是微不足道的。

从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史看，无论哪朝哪代，农户首要的

^{①②} 转引自陈越光主编的《农民学丛书》总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

功能是政府的税源，其次是兵源、役源。在传统经济时代，由于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农户所承担的“三源”任务是相当重的，农民的负担问题已成为研究者关注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是土地分配问题，在传统农业时期，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其主要生产要素劳动力和土地二者的配置合理与否有关。在大部分时期里，由于土地实行的是私有制，少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大多数农户拥有少量土地的矛盾长期存在着，严重制约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由此，土地的再分配基本上成为朝代更替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究者较为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就是农业的生产情况和商品化情况，前者是在传统农业时期研究农户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后者则很明显是现代农业时期研究者较为关注的一个方面。第四就是农业组织经营制度问题。可以说组织经营制度变革已成为农户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第五个方面的内容是新技术革命对农户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

1. 农户经济理论研究发展回顾

在农户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有两个主要学派，一是以俄国 A·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二是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这两个学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经济可能持续存在的事实的认可，这一点同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看法正好相背。恰氏认为，农户家庭经营在两个主要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户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用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家庭自给需求而不是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农户的劳动投入因为不以工资的形式表现，无法计算其成本，而投入与产出常常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在追求最大化上农户选择了满足自家消费需求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利润和成本之间的平衡。由此，农户经济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根据恰氏研究分析，农户分化的原因是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

比例变化，而不是商品化带来的农民分化，即一部分农户步入富裕户，而另一部分农户则沦为赤贫户。恰氏认为，俄国农户经济的改造既不是走斯大林式的集体化，也不是走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生产，而是自发地组成小型合作社。尽管恰氏论点在斯大林时期被压制，但是，欠发达国家农户经济组织持续发展的事实使这一理论仍存在着很强的生命力。

在斯密看来，农户经济也是前商品时期的产物，但是他的追随者却把农户经济拉入市场经济体系中，欠发达国家在本世纪农业的广泛商品化和发达国家在高度现代化下的家庭农场组织的持续存在助长了这一意图，由此形成了英国古典经验之外的另一个农业现代化模式。欠发达国家农户经济也伴随着现代农业投入的增长和市场交换范围的扩大而出现新的“绿色革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为这种希望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舒氏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户经济运行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并没有多少差别，农户经济中生产要素运行得如此成功，以致农户在生产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作为一种规律，在传统农业时期，农户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投资收益率很少有明显的不平衡。在这样一种经济组织中，农户的行为完全是有理性的。因此，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自农户进取心的缺乏、努力不够以及自由和竞争不足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所以农户对农业投资增长出现停止现象。舒氏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的获得，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应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舒氏在其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假说论证下，对农户贫困的根源也作了分析，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成就最好不要用初始条件的差异去解释，而要用政策的差异去解释。一国的贫困不是因

为贫困恶性循环所致，而是因为其糟糕的政策所致；不是不良的外在条件所致，而是不恰当的国内政策所致。农业曾是糟糕经济学的最大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到有损农业发展的地步，农业被榨取，农民对刺激的反应被忽视，土地每况愈下的经济重要性被置之度外。不恰当的经济分析造成了经济政策的失误，特别是扭曲了农业的刺激^①。运用舒氏的这一判断似乎更能恰当地解释中国农村改革前后农业与农户经济增长实绩的变化。按照舒氏观点，经济制度变革的最根本目标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要是没有人力资本的增长，那么除了那些从财产上取得收入的人们外，剩下的恐怕只有繁重的劳动和贫困了。

除了上两个学派外，还有一个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②，黄氏在综合分析了恰氏和舒氏的研究结果后，认为农户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可能是因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概念或农户家庭受耕地规模制约，家庭劳动剩余过多，由于缺乏很好的就业机会，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他在分析了解放前中国几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后提出了中国农业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概念，认为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就是一种反过密化的过程。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为实例分析，认为中国农业仍然处于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中。秦晖和苏文在以近代关中地区为实例分析，认为在农户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关中模式^③显然是一种不同于华北或江南模式^④，在中国广大地区通行的以租佃形式剥削农民的方式，

① 西奥多·W·舒尔茨的“论农业中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冲突”，杰拉尔德·M·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第22~4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② (美)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4月。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9月。

③ 秦晖、苏文著，《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

④ 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

在关中并不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地区农村的阶级对立并不十分严重，这一分析给“乡村改革派”以有力支持，乡村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认为，造成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这一观点同舒尔茨对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所以贫困的根源分析是完全一致的，解决的办法只有改革。但是，毛泽东等通过对中国南方广大地区的农村阶级分析，却得到了与梁的分析完全不同的结果，为此曾引起过一场著名的“毛梁争论”。尽管毛也认为是制度不合理造成的，但对这种制度造成的结果判断二者存在着严重分歧，所以为解决这种“病症”开出的“药方”也完全不同。事实上，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东西南北农户经济发育程度差异比较明显，不论是毛的观点，还是梁的观点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所以在选择改造传统农业或农民方式方法上也应当是多样化的。但是，在建国后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在全国的全面推行单一的集体化经营模式，并且将集体化经营模式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绝对化，拒绝农户家庭经营等模式的存在。显然这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完全吻合，所以，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集体化使得农村经济走上“死胡同”。进入 80 年代后，中国广大农村再度掀起了农户家庭经营的高潮，生产经营功能由此再一次回归到农户家庭中。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在全国的推广，标志着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新的经营时代——以农户经营为主，集体统一经营为辅的双层经营时代。

2. 农户经济研究方法回顾与评述

在农户研究方法中，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在解放前土地私有制度环境下，一种是以毛泽东、陈翰笙等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方法，将农户按拥有土地多少及收入获取方式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一种是以卜凯为代表的经营形式分析法，将农户按收入获取方式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还有一种是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经营目标分析法，将农户经营分为自给性生产